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巴蜀书社

译注 田南池

审阅 马樟根

明代散文选译



2 031 0335 5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明代散文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谭晓红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图：张自启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明代散文选译

田南池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 147 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310/35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有明一代，文学煌煌，不仅小说、戏曲成就斐然，其散文创作领域，亦高手如林，风格多样，流派纷呈。据不完全统计，明人别集在千种以上，卓然特立于文坛者不下数十家。无论是思想内容的表现上，还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明代散文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

近三百年的明代散文发展史，大致经历了洪武、永乐、弘治、嘉靖、万历和崇祯六次显著的变化。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他们或着意于传统的恢复，或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或强调心灵世界的开拓，或力主对现实社会的反映。概括地讲，明代散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观点的突破，把

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作为文章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代圣贤立言。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传达了这种新的文学精神，这是一次文学主体的觉醒，是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二是扭转了宋、元以来那种唯“道”是尊、轻文贱艺的衰颓文风，恢复并振兴了古文传统。注重师法唐、宋，同时博取先秦、两汉、六朝，拓宽了古文创作的途径，增强了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表现力。三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它突破了正宗古文的传统，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从而使古老的文体产生了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气象。下面就主要的文学流派和重要作家来介绍一下明代散文的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的古文发展到中唐、北宋，已进入其辉煌的顶峰，所谓“唐宋八大家”代表了它伟大的成就。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文化界，重道轻文，视辞章为末技的观念弥漫文坛。许多作品呈现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内容陈腐，质木无文，又摹仿语录体的腔调，读来令人生厌。这样，把散文创作从宋、元古文的死胡同中拉出来，重新使传统的古文闪耀出艺术的光辉，就成了明初散文作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1368年，朱元璋定都金陵，建元洪武，开始了朱明统治的新时期，社会由混乱趋于稳定，由分裂

走向统一。一个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学、新的作家。以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家携带着一股清新刚劲的文风应运而生。他们大部分从事创作于元末，多起于民间或下层官吏，亲身感受过民生的疾苦、社会的疮痍，抱有匡时济世的理想，并且学识渊博，善著文章。虽然在学术思想上仍未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由于他们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能超越理学的束缚，写出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或是感叹人生变故，或是渴求天下治安，或是记叙高人奇事，或是探索兴衰之道，使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毕现其中。其文风苍劲悲凉、阔深雄丽。

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其散文创作成就尤为突出，在当时文名极盛。高丽、日本、越南诸国曾以重金购其文集。宋濂积学深厚，精熟文理，兼擅诸体，而以传记最为出色。他善于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人物，能够抓住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他的另一篇名作《送东阳马生序》，写出了他早年不畏艰辛，刻苦从师就学的精神，影响很大。一些写景状物的文章如《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春松庵记》等也写得相当生动，简练有力。但有些作

品出于应酬，颇伤繁冗，又实开台阁体之先河。

刘基精通经史、兵法、术数，洞悉世情物理，为文雄奇瑰丽，洗练明畅，风格遒劲，特别擅长运用寓言形式。杂文集《郁离子》作于元末动乱之际，以寓言说理讽世，欲“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

（徐一夔《郁离子序》）书中虽有不少宣传封建纲常和统治权术的糟粕，但也有许多指责时弊、揭露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好作品，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松风阁记》、《苦斋记》、《活水源记》诸篇，清奇峻拔，可谓记中精品。《卖柑者言》议论犀利，语言形象，脍炙人口。

宋濂弟子方孝孺，长于议论，其《深虑记》十篇，纵论古今，言词恳切，虽为政论而文采郁郁。

比较强烈的现实性，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家们积极的创作实践初步改变了元末文坛上流行的纤浓缛丽的风习，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但是，由于当时文网严峻，人人自危，从而限制了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1403——1464）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政治上廉洁正直，很受宠信。其文章也借其声势而极盛一时。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明代

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明代以理学治国，朱熹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文坛上推崇一种雍容典雅的风格，而“危弦促管”、“怨尤勃兴”之作遭到排斥。“台阁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台阁体文章或奉敕而撰，或受托而作。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颂圣”文字。其风格雍容典雅而常流于呆板空廓，缺乏刚健清新之气。虽然如此，台阁作家文章也非一无可观。如杨士奇的一些言情写景之作，点染如画，一往情深，颇具欧阳修淡宕纡余之风韵，其《游东山记》便是这样一篇佳作。又如成化间入阁的李东阳，其文平淡清永，颇有情致。他已看出台阁体弊端，虽力纠其偏，但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难脱台阁体窠臼。

这是明代散文创作比较冷清沉寂的时期。当时作家群体比较狭隘，占据文坛者，多为达官显宦，在一般官吏和布衣中虽有解文之士，但人数不多，其名不彰。

随着明代政权的巩固，其内在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造成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流民问题；同时，西北边境又面临严重的外患。武宗残暴荒淫，宠信奸佞，致使统治者内部纷争不

已，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显然，这样内忧外患、国势日颓的严峻局面已使得台阁体无“太平”可“饰”，无“功德”可“颂”了。另一方面，明代自“弘治中兴”以来，伴随着政治的改良，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变革。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大一统”的天下。感于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激于新的文化思潮，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文坛上开始向“台阁体”发起了进攻。他们对儒术道学表示怀疑，很有些离经叛道之嫌，其文学观点亦悖于道学陈调，他们重视辞章之美，讲究文章技巧，要求“形神具出”、文情并茂。他们主张学习古文不必“近取唐、宋”、而应“直逼秦、汉”，这不仅因为秦、汉文章雄丽，风格多样，还因先秦时代思想活跃、学术自由。对南宋以来纤弱、枯质、单一的格调和迷信程朱、死守道统的风气，予以坚决摒弃。这实质上是一场在“文必秦、汉”的复古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文学革新运动。由于李、何等人的推动，弘治、正德年间的散文创作掀起了新潮。李梦阳的散文，力追秦汉，取材广博，雄深道丽，文采富赡。何景明以诗名世，而其文亦颇为可观，谨严洁净为其特点。应该指出的是“前七子”在创作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模拟蹈袭之病。他们学习古人往往生吞活剥，而乏陶冶熔铸之功，流于古怪生

涩。但由此便完全否定“前七子”的创作，看不到这场运动的革新意义，也失之于片面。如果把“前七子”的创作放在宋、元以来文体变化的进程中来加以考察，其起衰振溺之功便看得十分明显了。李贽曾称赞“前七子”的文章“荡涤南宋、胡元之陋，而后学者所准，彬彬郁郁，蔑以加矣”。（《续焚书·文学名臣》）这一评价，“前七子”当之无愧。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坛上“复古”之风愈刮愈烈。

嘉靖、隆庆两朝，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包括宗臣、徐中行、梁有誉、谢榛等人紧步“前七子”后尘，继续鼓吹“文必秦、汉”的理论，其声势较“前七子”更甚。这是因为“台阁体”余波未歇，而程、朱理学势力仍炽。“后七子”大力煽扬弘治以来的尚文之风，巩固“前七子”的阵地，同时也加重了模拟艰涩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其文“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可谓击中了要害。

“后七子”中，李攀龙摹古习气最重，为文好用古字僻语，故作奇奥盘曲之态，造出些锈色斑斑的假古董。唯其怀友抒情的短篇书札尚有可读之作。如《与宗子相书》气格清峻，笔力苍劲。王世贞不

象李攀龙那样墨守古人成法，主张“化工之妙”，但其创作仍未摆脱模拟之习，然其史论如《蔺相如》、《魏公子》、《岳飞》、《文天祥》等篇则笔势雄健，见解不俗。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为了挽救“正统文学”的危机而兴起的，其摧毁“台阁体”，扭转文坛风气的功绩不容抹煞，但其盲目摹古却又给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危机。针对“前、后七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弊病，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起来加以矫正。他们为文推崇唐、宋，学习唐、宋。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靡一时，影响颇大。因为他们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唐宋派”与“后七子”对峙近半个世纪。他们对于复古派的摹拟之风给予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唐顺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文章“本无精光，遂尔销歇”。针对复古派为文聱牙佶屈之弊，“唐宋派”提出了“文从字顺”的要求。

另一方面，“前、后七子”引起普遍不满的原因，除了其摹拟之病外，还由于他们的思想往往有偏离正统的儒家理学的倾向。茅坤曾批评李、何背离“正统”，讥之为“草莽偏垂”，比之以“项羽、曹操”。（《茅鹿门集·与慎山泉侍御论文》）王

慎中反复强调为文必须“专力于道”，“本之六籍”，特别推崇“思出于道德”的曾巩。由于“唐宋派”所倡扬的思想陈腐落后，缺乏战斗力，所以“唐宋派”最终未能成为复古派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过“唐宋派”的观点与道学又不尽相同，虽重道而不轻文，且讲究文章作法。其宗旨是要把当时的散文创作纳入文道并重、文词畅达的唐、宋古文的轨道。

在创作方面，归有光成就较为突出。他的一些怀旧思亲文章，如《项脊轩记》、《思子亭记》、《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较少道学家气味，情致绵绵，悲音袅袅，感人至深，正如近代古文家林纾所论：“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他的文章善于捕捉生动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即令人难忘。其语言平淡朴素，不事雕饰，而意蕴悠深。遗憾的是在其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的表彰孝子节妇的文章及寿序墓铭之类的东西。王慎中、唐顺之也多有可观之作。王慎中名篇《海上平寇记》气势磅礴，声色俱佳。唐顺之《竹溪记》、《胡贾棺记》、《入蜀稿序》等文也都是情理并至，“洸洋纡折，有大家之风”。（《明史·本传》）

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唐宋派”之外的徐渭则应该特别值得一提。他的诗、文、书、画、戏曲